

两博士后抢救石碑

报道◎李亦筠

leegh@sph.com.sg

摄影◎陈斌勤

用古老“复印术”留住历史

拓碑是保存文物的方法之一，两名拓片师深感本地老碑因岁月冲刷，风雨侵蚀，碑文日渐模糊，自告奋勇全岛跑透透抢救石碑，以拓片技术把碑上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。他们不分种族宗教，为庙宇、会馆、祠堂的碑，坟场的墓志铭等做拓片，为保留碑上文史尽一份力。

碑的纹路、字迹与图案，是历史留下的呼吸。每一笔镌刻，每一道裂痕，仿佛低语着久远的故事。然而，拓片师知道，这些“呼吸”是脆弱的，岁月冲刷，风雨侵蚀，使得许多碑文日渐模糊，甚至湮灭于人们的记忆里。

拓片师王思思博士（左）携手余康博士为茶阳（大埔）会馆的老碑做拓片，以保留碑上的珍贵资料。



拓碑第一个步骤是在碑面喷水上纸。

“新加坡的许多碑得赶紧拓下来。”拓片师余康博士站在茶阳（大埔）会馆一块老碑前，指尖轻轻划过凹凸不平的字迹，带着一份深沉的敬畏说道。对他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块碑，而是祖先智慧与文化的载体，是人类与历史对话的桥梁。会馆重视碑上的信息与历史，让余博士与王思思博士搭档做拓片。

本地许多老碑，未必有这样的机会，余康有感而发地说：“新加坡的碑情况不容乐观，如果没有更多人重视，这些碑就消失了！”

王思思博士急切地说：“为本地许多老碑做拓片，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”

抢救本地石碑刻不容缓

拓片（rubbing）指从碑刻、铜器等文物上拓印下其形状、文字或图案的纸片，是在印刷术和照相发明以前，中国人用以流传文字、图象的古老方法。即使在印刷和照相科技、三维扫描极为发达之后，拓片仍没完全被取代，因其“传真”和“传神”效果受到青睐。拓片可供研究、展览，作为修复碑的参考等。

来自中国的余康博士与王思思博



用锤具让凹凸部分在纸上显现出来。

士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和历史系的博士后，两人在本地修读博士时受到丁荷生教授的启发，决定做拓片来记录碑。从博士班毕业后，他们有空时全岛跑透透抢救碑。

余康露出担忧的神情说：“碑一直在败坏中，有的人选择框上玻璃来保护碑，但有些碑的材质根本不适合框玻璃；有些用现代科技去扫描并重新刻一个碑，这等于把老碑变成一个新碑，这样的维修方式很糟糕，很多信息都没了，也失去碑的历史价值和意义。如果晚十年再做拓片，效果是不同的，也是为什么我们得赶紧做。”

余康说，两人是从研究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，并不讳言地说：“我们没钱请中国的师傅来做拓片，只能自己做。我们当研究生时，因研究碑刻而接触到拓片技术，我们在中国有很多做拓片的朋友，可以向他们学习。”

两人前年开始做拓片，从马六甲开始，然后为本地金兰庙的碑、武吉布朗坟场的一些墓志铭，以及会馆、祠堂的碑等做拓片。王思思说：“我们已做超过100块碑。不限种族、宗教，碑在哪就做到哪。会馆的碑含有



以自制拓包上墨。

许多信息，我们计划把碑上的人名和商号名字，与庙宇已做好的数据库，以及另一批商业数据库连接起来，做相关研究。”

在茶阳会馆做拓片时，其中一块碑角落上的字体模糊难辨，不过难不倒两人。他们凭借过去研究过的历史，在做拓片前为碑文收集资料，精准推测出模糊的字是“坤甸”。

拓片步骤讲究手法力度

拓片，看似简单，实则繁复。先扫除碑上的灰尘，边为碑喷水边上纸，接着锤碑、刷墨，每一步都讲究手法与力度。一点点偏差，可能毁了整张拓片。这是一门需要耐心和敬意的技艺，一张好的拓片，承载的，是碑的灵魂。

余康释出一个笑容说：“我们经历了很多失败，才掌握到当中的技巧。”王思思补充说：“东南亚气候热又潮湿，我们采用湿拓法，即锤完了直接上墨，而不是等纸干了才上墨，这能确保我们上两三次墨的时候，纸还在碑上面。干拓法需要更多经验，中国有些师傅也许做了七八年，才能做出一张像我们这样比较美的拓片。”



待纸张达到适当干度后，便可以取下。

茶阳会馆外风呼呼作响，不过两位师傅手脚利落，没一会就做好拓片。余康说，户外刮风、日晒或阴天，都是做拓片的挑战。拓片讲求技术，有些纸适合某些碑，比如大碑，字体刻得很深的，要用厚一点的皮纸；小碑，字体刻得很浅的，得用很薄的纸。

王思思说：“在中国，拓片师傅讲究保留碑的纹理，但我们重视保留文字。比较小的碑，我们得用比较小的拓包去上墨。何时取下纸张要看几分湿，太湿会有重量，像一块布塌下来，太干又会黏在碑上。”

拓片在中国是一门传统技术，王思思说本地人却对拓片很陌生，“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纸要留在碑上，或者以为我们是来清洗碑。我们希望更多人有机会了解拓片。”

两名拓片师用双手记录着消逝的痕迹，同时期盼着更多人能走近这一技艺，感受它的魅力。两人要教授愿意学习的人，并认为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学，碑的故事便能流传下去。两人说时眼中有光，那是守护历史的坚定，也是对未来的期待。拓片的意义，对两人来说早已超越技艺本身，而是与历史的一场深情对话。